

共产国际在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教条主义

唐国琪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 德阳 618000)

【内容摘要】共产国际指导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教条主义具体表现在：一是在思想上实行禁锢，要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绝对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二是在组织上实施控制，强调干部的工人成份，重用留苏学生和共产国际代表；三是客观上存在时空差距，造成情报难以准确和误判形势的遥控指挥错误，不可避免地给中国苏维埃运动造成接二连三的重大失误。

【关键词】共产国际 苏维埃运动 教条主义 具体表现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2)08-0105-04

共产国际主观上对中国国情的复杂性、革命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以及中国革命、并没有深刻地研究和了解，更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是割裂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关系，总是形而上学地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客观上存在时空差距情报难以准确和误判形势的遥控指挥错误，造成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急躁、盲动、挫折、失误不断的教条主义错误。

一、在思想上实行禁锢

1. 要求中国苏维埃运动思想上绝对服从共产国际领导

早在1921年中共一大后，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就任中共总书记的职务。马林与其进行会谈，但双方在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上产生分歧，马林按照共产国际的体制提出共产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而陈独秀认为，中国共产党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还没有开展，没有必要套上共产国际的帽子。陈独秀还指出，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利，要有独立自主的作法。”^{〔1〕}(P100)

一九二七年以后，随着局势的好转，中国共产党内“左”的急性病发展起来，更重要的是，共产国际在1929年内接连写来四封信，都强调要“反右倾”和对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0月26日的信，它断言：中国进行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积极地开展着并且日益扩大着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群众的政治罢工，革命的示威运动，游击战争等等）。”并且认为：“盲目主义的错误，已经大致纠正过来。”^{〔2〕}(P91)为后来产生的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

义错误，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只有三个多月（1930年6月到9月），但党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许多地方党组织遭破坏甚至瓦解，红军损失惨重。而且共产国际在对中国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中，共产国际指导思想上的专断所表现出来的错误思想就显而易见。

“既然你们自己也说，你们与共产国际在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那么你们为何要迫使全党面对这一决议，为何要迫使各个支部接受这一决议呢？如果归根到底可以推断，你们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由于我们不能设想是出于什么恶意），想在共产国际决议到来之前，尽快借助[你们的]决议来指导全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制造这一决议时所使用的其他方法才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曾约定把决议草案给我们，但你们却通过了决议，友好地告诉我们说，决议已印好，要是我们不同意党发表这一决议，那我们就停止革命工作。”^{〔3〕}(P178)

2. 要求中国苏维埃运动行动上绝对服从共产国际领导

“陈独秀是典型的文人革命家，他因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战略（来自莫斯科的决议，平均两天半一个）导致大革命失败，结果却被扣上一顶“右倾投降主义”大帽子，在党内名誉扫地。导致大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遥控中国的共产国际，恰恰不在于对此提出异议的陈独秀。托洛茨基在会见刘仁静时就说：“中国革命失败了不是陈独秀败于蒋介石，而是共产国际领导失败了。”^{〔4〕}1927年经过大革命失败和南昌起义的成功，中国共产党决定举行长沙起义。“计划的要点是：由各团分路出发，同当地农民暴动结合，对长沙取包围态势，各路得手后，以长沙工人暴动为内应，一举夺取长沙。起义在9月9日发动，一度占领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但由于反动军队的力量远比起义军强大，各路起义军先

* 作者简介：唐国琪（1955—），女，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辩证法等方向的研究。

后遭受严重挫折,夺取长沙的目标无法实现。”^{[2](P71)}“这时毛泽东表现了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的本领。看到进攻长沙的计划无法实行,他便当机立断地改变原有部署。9月19日,前敌委员会在浏阳县文家市举行会议,经过激烈辩论,否定了一部分人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决定迅速脱离平江、浏阳地区,进入江西省,沿罗霄山脉南移,在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地,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革命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2](P105)}共产国际不顾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实际情况,不做深入的了解和调查研究,就指责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战略转移是保守主义、游击习气、退却主义,并且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沙起义失败后,转向农村提出质疑:“当你们红军撤离长沙的时候,我们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我们不理解这种撤退,它与所实行的方针是相抵触的。”^{[3](P301)}“但是,从军事角度来说,撤出长沙确实是必要的吗?确实我们应不经过激烈的战斗就撤出这个城市吗?对此,我们持怀疑态度。而且项英在汉口向我们作了汇报之后,我们的怀疑更加深了。项英向我们作了说明,我们撤出长沙的主要原因不是军事上的,交出该城的主要原因是采取了老的保守的游击方针。他们占领村镇、城市,在遇到较多兵力进攻的情况下,就撤离,就退却,为了以后有可能在另一个地方再发起进攻。”^{[3](P302)}随后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在1936年6月20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指出:“你们决议第三部分第10段和第11段的提法,即‘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与全国革命政权的建立’的政治性质引起了我们的怀疑,这种提法太笼统、太抽象,因此,我们非常担心,它什么也说明不了,相反会使一切机会主义更能对在目前形势下进行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产生动摇和失败主义的情绪。”^{[3](P179)}“例如,在江西,我们在30个县拥有苏维埃政权,而且有10个县城在我们手里。我们的领导同志不去夺取这些县城和建立连成一片的苏区,而是热衷于攻占大城市。我们认为,在这方面军事指挥犯了重大的政治错误。”^{[3](P443)}共产国际在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表现在对中国革命的实际不熟悉,因而对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工农武装割据作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指示。1931年,“中共临时中央的着眼点,是基于共产国际的指示,片面强调苏维埃政权同国民党政权的对立,急于要求‘把分散的苏区打成一片’,‘联系成整个苏区’,似乎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已近在眼前,这种估计是不切实际的。”^{[2](P95)}这时毛泽东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是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原因的指导思想,以及已形成的一些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战略态势,既分散但又能在革命斗争中彼此相互联系,在革命紧急关头能里应外合,争取外援,打破反动武装的包围、镇压,是极为有利的一种中国特有的苏维埃运动的战略布局。而共产国际不顾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实际,一味地强调要将苏区打成一片,连成一片,形成一个独立的中央苏维埃国家政权。这是绝对不符合中国当时中国革命的国情。

二、共产国际在组织上实施控制

1. 在干部问题上强调工人成分

在选拔干部问题上,共产国际片面强调工人成分的影响,

“对组成指挥员骨干的问题必须给予特别重视。如果说,在普通士兵方面基本任务是使士兵农民化,那么在指挥员方面,一切措施都应旨在使绝大多数指挥员由工人来担任。为此目的,必须在城市里从工厂、工场和作坊中选拔最有觉悟的工人,尤其是在失业者中选拔,派他们去游击区工作。”^{[3](P444)}在共产国际指示下,上海工人顾顺章也进入了中共有关重要领导机构担任领导工作,共产国际认为中共领导层中缺少工人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于是,在中共六大上,码头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推上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全盘照搬苏俄革命的经验,竭力鼓吹城市暴动,轻率地举行罢工和游行示威,甚至派人去工厂强自罢工等,导致中国革命的失败不可言喻。“1931年4月下旬,协助分管党的保卫工作,掌握大量中共中央核心机密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向国民党当局建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6月下旬,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的向忠发又在上海因个人自由行动而被捕很快叛变。”^{[2](P94)}事实证明,顾顺章、向忠发等人,无论是他们的政治信仰还是理论素养、革命意志的坚定性上,他们在当时并不具备中共领导人的这些素质条件。顾顺章、向忠发的先后叛变,给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行动计划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挫折,都证明了共产国际在指挥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片面强调从工人中选拔干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导致中国革命的重大损失。

2. 重用留苏学生领导苏维埃运动

共产国际重用和信任没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和中国革命运动过程的基层工作的经验,因而对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的留苏学生王明、秦邦宪等人,并对他们委以重任,领导中国苏维埃运动,给中国苏维埃运动造成的损失就在所难免。“(1927——1931)这段时间里,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九卷中发表的陈绍禹(王明)、沈泽民、秦邦宪(博古)和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许多学生绕过中共同共产国际的通常联络渠道,同米夫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其他领导人交往的书信表明,东方书记处领导特别器重这批人,把他们看作是‘可靠的’和忠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人员,指望得到他们提供的关于党内状况的情报,而往后逐渐地把他们提拔到中共和共青团领导机构的各个岗位上。毫无疑问,陈绍禹由于跟米夫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以往的联系受到特殊的信任。1930年7月至8月间李立三主义盛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多数成员同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生冲突,随后在党内对批评自己方针的人进行迫害,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远东局决定加速选拔‘莫斯科派’的进程,便保证中共领导对共产国际的持久忠诚。”^{[5](P25)}

“1931年1月7日,在来到中国的共产国际的代表米夫直接干预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四中全会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原来不是中央委员,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二十六岁王明,由于得到米夫的支持,不仅被选为中央委员,而且

成为政治局委员。从这时起,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机关内开始长达四年的统治。”^{[2]P108)}

王明持一种比李立三“左倾”错误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立场,“王明还散发他的纲领性小册子《两条路线》。王明、秦邦宪等他们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急于夺取一个或几个包括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的胜利,指责中国当时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宣传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宣扬和推行实际上更‘左倾’的教条主义路线和政策。”^{[2]P99)}

王明、博古(秦邦宪)等一些留苏学生受共产国际信任,而这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认识,也仅仅是停留在对理论知识熟练的程度上,根本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寻找或创造出符合中国革命和苏维埃运动的路线、方针、政策。尤其是王明、博古等自恃受共产国际的信任,是共产国际的代言人和中国共产党的代言人的双重身份,也能大段大段地背诵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文章段落,就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自居,而国内一些革命者也对他们的留苏经历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章的了解和参加过十月革命的经历等,也有一种崇拜和信任,加之他们受共产国际指派的身份,使他们在党内,在革命斗争中的领导地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因而就产生了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正确的要执行,不正确的也要执行的一种盲动主义的错误倾向。王明、秦邦宪等留苏学生对中国国情和中国苏维埃运动并没有做深入的研究,也没有实际的革命斗争经验和中国革命运动过程中的一些基层工作的经验,却能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和临时中央的领导身份,对中国苏维埃运动指手划脚、发号施令、文过饰非、有意夸大或隐瞒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和白区的工作所遭受的失败与困难。如1933年1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第六次和第七次会议上,王明作了题为《革命战争干涉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长篇演讲,王明不顾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和白区工作中所遭受到的失败和困难,“自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以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巩固了、扩大了,中国工农红军巩固了、发展了。他认为中央苏区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比法国、德国、英国、日本都大得多。”^{[6]P34)}

3.派遣共产国际代表指导苏维埃运动

1932年,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派遣,到中国从事革命活动的李德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国民党蒋介石反动的统治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中共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于“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依靠和共产国际有关系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思)负责军事指挥。李德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种正规的阵地战的经验,并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战争中之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提出‘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和‘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等错误口号,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命令红军主力北上应敌,结果是红军转辗于敌

军主力和堡垒之间,陷于被动地位。在进攻遭受挫折后,他们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这样就使战争的发展对红军日益不利。”^{[2]P100)}

“在1933年10月至1934年10月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李德亲自参与了军事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被调到福建‘剿共’前线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政策的感召下和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推动下,发动了‘福建事变’,公开宣布反蒋介石并在福建成立了‘中华共和国革命政府’。并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双方草签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曾在1933年1月17日发表宣言,愿意在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抗日作战协定。然而,‘左’倾路线领导人博古完全抹杀福建政变的积极意义,甚至把中间力量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是对人民的‘欺骗’。当国民党派军队到福建去打十九路军时,‘左’倾机会主义者不组织出击,让其畅通无阻地通过根据地。当时苏联正同蒋介石南京政府改善关系,共产国际也没有支持红军同十九路军联合反蒋。作为军事顾问的李德,也主张红军主力西调,结果‘福建事变’失败。而且也使红军失去了一次对红军粉碎‘围剿’很有利的机会,反而使中央革命根据地受到了更大的威胁。由于红军坐失良机,蒋介石便得以在打败福建人民政府后完成对中央苏区的四面包围。而红军继续在李德的错误指挥下,兵日少而地日蹙,最终导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长征途中,李德继续瞎指挥,使过湘江的八万多人的红军,只剩下三万多人,红军伤亡、损失惨重。”^[2]

三、客观上存在时空差距使情报难以准确和错误判断形势

1.情报难以准确

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由于空间距离的遥远,导致指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时间上的迟缓延误时机的同时,也造成情报来源不确切、夸大事实,难以准确的指导失误。“除了由于缺乏其他的情报来源,尤其是不了解中国农村地区的状况以外,共产国际执委会内总的氛围,也是不加批判地接受这些情报的重要原因。”(《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1927—1931)第九卷前言第9页)“后来发现,远东局本身夸大事实、虚假的吹嘘,给共产国际提供不实的情报,同时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不加批判地转述了来自中国共产党的严重夸大的关于中共红色工会人数及其发展变化情况的材料,特别是强调红军、游击运动和农村苏区的成功发展(第209、229号文件)。这表明,远东局依赖中共领导人的情报,看来也表明远东局担心被指责对局势估计犯‘右倾’错误,而当时莫斯科对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的分歧还不作决定。”^[2]

“目前,对苏区的第六次围剿可以说,已经基本结束了。这次围剿的结果怎样呢?‘丢掉相当大的一部分中央苏区,这是十分显然的损失。但是,这种地域上的损失,不仅应看作是暂时的事情,不仅红军在其他省份夺占的地域能予以

补偿,而且第六次反围剿的一系列积极的成果要比它大得多,这就是塞克特将军和蒋介石的计划,即战略包围和歼灭中国红军的计划破产了。尽管敌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他们没能达到这一目的。红军非但在人数上没有减少,而且在激烈的搏斗过程中,大大增加了有生力量,红军部队反而增强了。”^{[7][P321]}明明是红军在反围剿中伤亡惨重,地盘大量丢失等极为危急的革命形势,却被夸大成革命形势处于十分有利的情形。“后来发现,远东局本身同时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不加批判地转述了来自中国共产党的严重夸大的关于中共和红色工会人数及其发展变化情况的材料,特别是强调红军、游击运动和农村苏区的成功发展(第209、229号文件)。这表明远东局依赖中共领导人的情报,看来也表明远东局担心被指责对局势估计犯‘右倾’错误,而当时莫斯科对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的分歧迟迟不作决定。”^{[5][P8]}“除了由于缺乏其他的情报来源,尤其是不了解中国农村地区的状况以外,共产国际执委会内总的氛围也是不加批判地接受这些情报的重要原因。”^{[5][P9]}这些虚假的夸大事实的情报,的确误导了共产国际对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指导,使共产国际在中国苏维埃运动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教条主义。

2. 误判革命形势

“1931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已取得了统治地位。中共临时中央不能正确认识并处理这些问题。它作出的一系列决议,使‘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实际工作中进一步得到具体运用和发展。”^[2]“共产国际认为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主要是‘向反苏战争又前进了一步。’”^{[8][P167]}“中共临时中央照搬共产国际指示,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这种说法完全脱离实际情况,自然难以为中国人民所接受。”^[9]

1932年8月有27日—9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没有专门讨论中国革命的有关问题,但这次会议把革命和战争的指示硬搬到中国,在日本侵略下中国正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完全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这次会议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六项不切实际的任务:“(一)在进行民主革命斗争的口号下,动员群众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他帝国主义者,争取中国独立和统一;(二)发展和统一苏维埃区域,巩固红军;(三)进行斗争

来推翻国民党政权;(四)坚决地实行把赤色工会变为群众组织和夺取国民党工会里的工人群众;(五)扩展游击运动,在东三省提出以下的口号:建立农民委员会,抵制捐税和政府命令,没收帝国主义者走狗底财产,组织选举的人民政权;(六)普遍宣传苏维埃区域底成绩和中国工农与苏联工农亲密联合的口号。”^{[7][P321]}共产国际在中华民族已处于生死存亡的抗日阶段,却向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提出了一些严重不符合中国人民革命实际需要的任务,显然是误判革命形势,给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造成的挫折和损失不言而喻。

毫无疑问,共产国际在指导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同时,给予了在政治、经济方面的道义上、理论上、实践上、资金上等一些实际的具体帮助,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指手画脚、脱离中国国情,强制推行俄国的经验和绝对服从共产国际的意见,无一不给中国革命造成重要的政治影响,而这些影响又都来自莫斯科,正如陈独秀在1929年在一封公开信中指名道姓批评斯大林“都是斯大林布哈林所主持的国际领导机关之所赐”^[9]。使中国苏维埃运动在教条主义的影响下,造成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严重挫折和损失不可估量。

参考文献:

- [1]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M].人民出版社,1980.
- [2]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3]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0(第八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 [4]文摘周报.被尘封的中国托派[N].2010-9-7.
- [5]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九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 [6]于俊道编著.中国革命中的共产国际人物[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 [7]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文献资料(1929—1936)(第2辑)[M].中国社科出版社,1982.
- [8]反对日本侵占满州.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2辑)[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 [9]张家康.陈独秀最早批评斯大林[N].老人报,2011-5-4.